

新闻研究资料

XINWEN YANJIU ZILIAO

- 民意调查在中国
- 东瀛访报记
- 《向导》周报对第一次
国内革命战争的指导
- 中国电视大事记

新闻研究资料

总第四十六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新闻研究资料》编辑部编辑

DA36/06



一九八九年六月

新华书店

PDG

主 编：何炳然

副主编：阎焕书

新闻研究资料

总第四十六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新闻研究资料》编辑部编辑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景山学校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7印张 160,000字

1989年6月第一版 1989年6月第一次印刷

ISBN7-5004-0601-0/G·13 定价：2.20元

目 录

· 当代新闻史专题探讨

- 民意调查在中国 陈崇山 (1)
- 假新闻照片的第一次公开曝光 朱世龙 (19)

· 新闻界人物

最后相处的日子

- 纪念我敬爱的父亲萨空了 萨 运 (28)

- 我所认识的费彝民 陆 铿 (33)

铁骨铮铮的新闻战士

- 记陈子涛烈士的光辉一生 罗庆新 (47)

· 新闻事业史料

- 东瀛访报记 (上) 方汉奇 (56)

清末几家有影响的民间报刊之创刊与特色

- 何炳然 (77)

- 上海人民反对印刷附律的斗争 马光仁 (104)

- 新四军在华中敌后创办的《新华报》 傅义桂 (117)

我国最早的藏文报纸——《西藏白话报》

- 白润生 (124)

· 学习与研究

- 《向导》周报对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

指导.....蔡铭泽(128)
对“耳目喉舌”论历史的回顾与反思.....吴廷俊(143)
南京《新民报》复刊后的编辑特点.....高永志(153)

• 广播电视史料

中国电视大事记(1955—1978).....郭镇之(169)

• 海外华文报刊

拉丁美洲国家的华文报刊.....方积根 胡文英(185)

• 考订·补遗

“中国近代科技期刊简介”补遗.....谢振声(202)

中国新闻事业史报刊资料索引(1986年)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资料室(207)

民意调查在中国

民意调查，是一种运用现代化的科学方法及数理统计手段，迅速、及时、准确地收集、整理、统计、报告民众意见，测定社会舆情变化的社会活动。其功能在于如实反映各阶层民众对某人、某事或某一社会问题的态度、评价、意见或建议，提供给各级政府、政党团体或企事业单位作为决策或改进工作的依据，或者通过新闻媒介广为传播，作为引起全社会注意的警报，成为社会舆论的向导。

民意调查，是一种社会需要。社会的主体是人，是不同民族、不同年龄、不同教育程度的人。人是具有高级思维能力的动物，每一个人的思想，必然要通过语言文字等多种方式表达出来，以达到同类交往的目的。因此说，表达意见，是人的基本需要，一切具有正常生理条件和社会意识的人，都具有表达意见的需要，保障和尊重人的这种基本需要，是文明社会的起码标志。

民意调查，是民主政治的产物，起源于美国。亚柏拉罕·林肯认为：“如果没有得到他人的同意，这就是说，如果没有让他人表示其需要、其欲望、其关于社会事务应如何进行和社会问题应如何处理的意见，任何好人或聪明人都不

能治理他人。”^①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在论证同封建贵族政治概念相反的民主概念时说：“必须积极地而不是消极地征询每人的意见，使每人本身成为权威过程和社会支配过程的一部分；必须使每人的需要与欲望有被记录下来的机会，使其在社会政策的决定上起着作用。当然，与此同时，实现民主主义的另一必要的特点是：互相讨论与互相咨询，并最后通过综合和归纳一切人的观念和欲望的表现而达到社会支配。”他认为：“询问他人喜欢什么，需要什么，有什么意见，这是民主观念的一个要素。”^②美国人的民主观念，是美国民意调查蓬勃发展的土壤和条件。

美国的民意调查是由新闻界最早发起的。1824年总统选举前，《哈里斯宾夕法人》报曾采用“小票量法”预测选举结果并予以公布，以后许多报刊纷纷效法，引起美国民众的兴趣和政府的关注。这种调查开始是在有产阶级中进行的，方法也比较简单，如1924年《文摘》杂志的全国性调查，是从电话号码簿和汽车登记册上抽取调查对象的，从而排斥了大部分贫困的美国公民。^③直至1935年10月正式成立盖洛普民意测验所后，才进一步完善操作程序，探索出一种能够排除一切主观随意性并能使调查结果尽可能接近客观实际的、“无懈可击”的方法，应用范围也从预测大选结果扩展到社会各种问题的舆情调查。

我国台湾省学者称盖洛普是“将民意测验方法带进现代化的鼻祖”。而美国有的学者却认为卡尔·马克思是民意调查的真正鼻祖。早在1880年，马克思根据法国工人生活的现

^{①②} 见约翰·杜威：《人的问题》第25～26页。

^③ 见李海容：《东西方民意测验的比较研究》第3～4页（论文）。

状，拟定了一份《工人调查表》，提出100个问题，其中45%是属于工人劳动条件的，35%是关于工人物质状况和法律地位的，还有20%是关于工人组织和合作组织的。^①遗憾的是至今尚未发现这次调查的结果。

至于中国的民意调查始于何时，有人说，“民意调查始于周朝，当时的太师就是专司舆论搜集与民意调查的机构，当时设置的‘行人’、‘道人’等的任务是‘使之四乡以采诗’。”^②古时的行人泛指出行的人、出使的人或出征的人。行人不论外出采诗、打仗或访问邻国，必然会带回一些有关社情民意的新信息，但这同从尊重民意出发，主动征询民众对社会事务意见的民主政治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中国实行封建专制统治长达数千年，君主是天帝的唯一代表，所有臣民都只能是俯首贴耳听命于他的奴才。一方面封建统治者视民意为洪水猛兽，“防民之口胜于防川”，另一方面中国民众在专制政治的高压下又缺乏表达意见的胆识和欲望，于是，“莫谈国事”成为国民心理规范的信条，“话到嘴边留三分”则成为民族性格的特征。纵有少数敢于仗义执言者，也难免遭受厄运。在这样的历史环境里，根本无民意可言，岂有民意调查之举。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于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北京大学，揭开了我国民意调查的序幕。

1923年12月17日，是北京大学建校25周年纪念日。16日

^① 见《北京读者、听众、观众调查》第3页。

^② 见台湾《15年来民意测验汇编》。

和17日两天，自上午10时至下午5时，对前来庆贺的师生、校友和宾客作民意调查。“事前绝守秘密，知者极少”，两天接受调查者共计1007人，其中学界752人（含女性47人），新闻界11人，军界9人，工界7人，政界11人，警界2人，商界8人，未注明职业与性别者207人。年龄大体在16岁到40岁之间，平均年龄在26岁左右。调查问卷提出10个问题：

“1. 你对于曹锟做总统有何感想？2. 你相信当令国会吗？须怎样办？3. 你对于此次政府所颁宪法取甚么态度？4. 下列各种方法，你以为那种可以救中国——军阀宰割，外国共管，国民革命？5. 俄国与美国，你以为谁是中国之友？为什么？6. 你心目中，国内或世界大人物是哪几位？7. 现在中国的日刊、周刊，你最爱看哪一种？8. 现在中国流行关于政治方面的各种主义，你相信哪一种？9. 你对于目前学生运动有何意见？10. 你最爱作如何消遣？”所填调查问卷由20余名北京大学的学生开卷统计。

1924年3月4日至7日的《北京大学日刊》登载了这项调查的报告，其中最重要的发现是中国人对民主政治的追求。报告结论指出：“就民主政体之原则上说，其国之元首，必得大多数人之信仰与赞助，而后始能代表国人而行使其职权；其国之国会议员，亦须国人重视而爱护之，而后始能代表真正民意；其国之宪法，国人尤须表示遵守，视为神圣，而后始能纳政治于轨物。今吾人所测知之结果，对于曹氏，则不信其为总统；对于国会议员，不曰解散逐走则曰宰杀活埋；对于宪法，则多数表示反对，然则今日之北京政府，将不见信于国人矣。然则何为而可？曰：以‘国民革命’之手段，推翻其所不信之政府，拥护其所深信之中国大

物，建设其理想中之社会主义国家，此答者对于中国内政之主张。排美连俄，反抗国际帝国主义，使中华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完全独立，此答者对中国外交之主张。”

由于接受调查的人中74.7%是学界人士，因此在中国革命主力军的问题上出现偏颇，认为“国民革命之成功，全靠学生运动之努力如何而决定”。这次调查开我国民意调查之先河，开始冲涮我国数千年“言禁”的堤坝。

然而，帝国主义的入侵，军阀的连年混战，“所有这些，都表明救亡的局势、国家的利益、人民的饥饿痛苦，压倒了一切，压倒了知识者或知识群对自由平等民主民权和各种美妙理想的追求和需要，压倒了对个体尊严、个人权利的注视和尊重。”^①民意调查并未引起社会的注意和重视。

据记载，中国新闻史上旨在研究新闻理论而开展的大规模民意调查，是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校长顾执中，在1936年底至1937年初组织全校师生50多人进行的“上海报纸和上海读者调查”。调查问卷提出8个问题：1. 读者姓名、性别、年龄、职业、籍贯、住址；2. 现读何报？何故？3. 何家报纸为最优？优点何在？4. 喜看何种记载新闻？一张报纸所记载的种类假定分为：国际、国内政治、外交、经济、社会、文艺、特刊、广告、其它？5. 文字艰深否？何种文字最适当？6. 报价太贵否？7. 对看过之报，作何处置？8. 读者对于报纸的批评。要求读者对上海市发行的每家报纸的内容、形式、文风以及价格都作出评价。由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师生担任的调查员按马路分工，逐户分送调查表，3

^①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话》第33页。

个多月共回收调查表 5 千多份。尽管获得了读者对上海报纸的大量“忠实的批评”，但读报人之稀少，令顾执中先生感慨万分。他叹息道：“中国接受教育洗礼的人数稀少，而能摊开一张报纸来研究国事的人，更是寥若晨星。”因此在进行定量分析时，有些项目不得不以“千分之几”来表示。

通过这次读者调查，顾执中先生发现，上海市读者的读报兴趣集中于国内政治新闻和国际新闻方面，表示喜欢读国内新闻的读者多达 89%，其中 62% 的人表示最喜欢读；表示喜欢读国际新闻的人占 82%，其中最喜欢读的人占 54%；同时发现有 60% 的读者不喜欢广告，58% 的读者不喜欢经济新闻。读者对报纸的批评建议大都是“报纸要替人民说话”、“报人应勇敢，不应不敢披露真实消息”、“报纸为民众之喉舌，应翔实无讹”等意见。^①

这是一次企图以读者为主体，从读者的需要兴趣出发研究新闻理论的尝试。研究者的目的十分明确：“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新闻事业底研究，不特是理论的，而且要实际的。我们要把我们所找得的实际，来证明我们的理论，决定我们的认识。”^②然而不久爆发了长达 8 年的抗日战争，使这项具有开创性的新闻学研究不得不宣告夭折。

深重的民族灾难使国无宁日，民不聊生。当时的国情不允许建立专门的民意机构开展民意调查，对社会舆论的调查研究大多由新闻界主动承担，做得最经常、最出色的要数重庆《新华日报》。它创刊于 1938 年 1 月 11 日，同年 2 月 17 日和 19 日两天，便相继在头版刊登征求读者意见的广告，在 4

^{①②} 见《新闻记者》1937 年第 1 期。

版刊登读者调查表，热诚恳请读者对报纸内容提出意见。从回收的调查表分析，填表人中24%是学生，19%是工人，17%是机关职工，11%是店员和救亡团体工作者，5%是军人和自由职业者，还有2%的外籍读者。报纸编辑部把读者的意见看成是“有价值的指示”，作为改进报纸工作的“准则”，每年1月1日报庆之际，必定开展一次读者调查，用整版篇幅刊登读者对报纸的意见和编辑部针对读者意见打算改进的措施，要求读者监督这些措施的实行。读者把报纸看作是照耀人民前进的灯塔，是向人民传播真理、弘扬民主的阵地。有的读者说：“一顿饭可以不吃，一天不读《新华日报》不行。”而报纸则把读者看成“最亲密的战友”，多次指出“我们之间的友谊是伟大而不可摧毁的。这就是《新华日报》的力量！它的存在、壮大和发展的根源！”《新华日报》是我国新闻史上民主办报的光辉典范。

而在国内外引起较强烈反响的是《大刚报》的一次民意调查。《大刚报》是一家民营报纸，1942年10月10日，它在报纸上刊登10个问题，测定中国民众对抗战前途的看法。截至11月9日，共回收读者答案1230多封，其中99.6%的人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必定能得到最后胜利，充分表达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不少外国通讯社和报刊转播或转载了这次调查的结果。美联社评论说：“如一国具有清明之舆论，则该国至少已踏上民主政治之途。中国似已在民主政治中，获得极大之进展。当日本军被驱逐出境后，预料中国在民主政治方面，必将获得更大的进步。”^①

① 见《新闻研究资料》第24辑，第127页。

40年代初期，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曾严厉批判了那种“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象”，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半知半解的坏作风，提倡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对国际环境的现状，作系统而又周密的调查研究。毛泽东有一句名言，叫做“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强调要“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

开调查会，“解剖麻雀”，这是毛泽东同志倡导的调查研究方法，他说：“开调查会，是最简单易行又最忠实可靠的方法，我用这个方法得了很大的益处，这是比什么大学还要高明的学校。”^①几乎所有党的干部都懂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道理，都学会了开调查会的技巧。每每颁布新的政策法规，各级干部都要深入民间开调查会，并将搜集到的民众意见写成情况简报，逐级上报中央，作为最高领导层决策的依据。也有部分情况公诸报端，作为对社会舆论的引导。不论是内部上报或公开发表，都能达到下情上达、互相沟通的目的。但是，开调查会的方法毕竟只能听取少数人的意见，对民意缺乏量的分析，尤其在极左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期，这种调查方法的主观随意性日益增强，调查者往往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先验地将人群划分为敌、我、友，或者以政治表现为准绳，先验地将人群划分为左、中、右。划分的标准是以我为核心，顺我意者为左派、为友人、为同志，逆我意者为右派、为敌人。对调查材料的取舍同样具有主观随意性，合我意者大肆宣扬，悖我意者压制打击；强调

^① 见《毛泽东选集》4卷本，第790页。

舆论一律，排斥不同声音，终因不能完整地、全面地、准确地反映民意，导致决策性失误而酿成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性悲剧。

而在50年代末期，台湾出现了专业民意调查机构“中华国民民意测验协会”。该会成立于1958年，有新闻、出版、电影、教育、医学、金融、交通、商业、农林牧渔及社会服务业等团体会员79个。这个民意调查机构承办政府机关、团体及企业委托的调查项目，在成立后的15年内，进行的民意测验计有政治的38项、经济的26项、文教的15项、社会的11项、交通的21项。该机构自称遵循“公正、坦诚、荣誉、效率”的原则，“负起宣扬国策、疏导民情、发掘问题、反映民隐的重大责任，以作政府与人民沟通意见的桥梁”。它确实也作了一些有益的调查，比如自1964年始，每年举行一次的“公路旅客意见测验”，请旅客对汽车司售人员的服务态度、安全行车、清洁卫生作全面的评价，这无疑对公路服务质量的改善和提高是一大促进。但是，这个民意测验机构未能摆脱政府和政党的操纵和控制，这从该会理事长吴望仪在成立大会上对该会宗旨的阐明中可以看出。吴望仪说：“民意测验是今代世界潮流进步的产物，是民主法治自由国家的新兴事业。我们成立这一个民意测验的团体，目的就是在鼓吹推动这一个世界上新兴的事业，以寻求民意和发扬民意，要以伟大的民意表现力量，来摧毁禁锢民意的共产铁幕，发扬人类尊严与生存价值，希望大家集思广益，群策群力来负荷这一意义深长的神圣工作，以符合蒋总统加强实施民主宪政建设三民主义新中国的要求。”

理事长的这一番表白，极不明智地将该协会沦落为国民

党的御用工具，而违背了“寻求民意和发扬民意”的初衷。

1972年10月5日至11月12日，该协会组织的所谓“国是意见测验”，便是一个亵渎民意的典型例子。这次调查直接访问者500人，通讯征询者1500人（实际寄回问卷者302人），共计802人，其中侨居亚洲者占82.68%，侨居北美洲者占7.98%，侨居南美洲者占3.85%，侨居欧、非、澳各洲者占5.49%。在问卷提出的6个问题中，有一个问题询问调查对象如何为“反攻大陆献身工作”^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华民国民意测验协会组织以反共为目的的所谓民意测验，也许有其难言之苦衷。由此看来，民意调查机构要想真正反映民意，真实反映民意，必须摆脱任何形式的控制和干预，保持品格的独立。

民意调查在大陆的兴起，是在80年代。众所周知，60年代中期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给人民带来了史无前例的灾难，以言获罪、以文获罪的人多不胜数。林彪、“四人帮”一伙剥夺了人民言论出版自由，新闻媒介无一例外地统统沦为他们实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的驯服工具。高度的舆论一律，使新闻媒介走向广大民众的对立面，致使广大民众宁肯相信小道消息，也不肯相信新闻媒介。因此，在粉碎“四人帮”后，新闻界陷入深沉而痛苦的反思，力图在拨乱反正之中，摆脱和消除帮派习气，维护思想言论自由，改善同民众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国历史的转折点。全会决定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加强民主，从而为社会主义民

^① 见台湾《15年来民意测验汇编》。

主建设提供了新的理论根据，也为民意调查扫除了思想障碍。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国在不断引进世界新技术革命成果的同时，也引进了西方传播学理论和现代民意测验新方法。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率先开设传播学课程，最早组织学生在上海开展小规模民意调查，如1981年1月，毛用雄等5人在上海图书馆和复旦大学阅览室作的“重大新闻传播过程调查”，对审讯“四人帮”消息的传播渠道作了实地考察。1982年初，张伟、焦扬等利用上海市电话簿抽取400人，对上海市区居民接触新闻媒介的状况作了调查。由于经费不足，当时只能用手工统计。

引起国内外注目的是198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和首都新闻学会（当时为北京新闻学会）受众调查组开展的北京地区读者、听众、观众调查。这次调查由北京市统计局制定的抽样方案，“严格按照随机原则抽选样本，即总体中的各个具体单位都有同等被抽选的机会，选中与否完全根据其数值规律及其概率大小的演变。它排除任何主观意图的影响，保证抽选的样本单位结构和成数，具有与总体规律一致或近似的结果，因而使样本单位成为总体单位的缩影。同时，保证样本单位具有比较好的宏观代表性”。“方案使用类型抽样法，突出人口职业标志的作用，将全市人口划分为22个职业部门，充分使用各单位的职工人数资料，由电子计算机分层抽选样本。”^①调查于同年6月至8月进行，共调查12周岁以上居民2423人。调查问卷提出54个问题，前24个问题

① 见《北京读者、听众、观众调查》第188～189页。

对北京受众接触报纸、广播、电视的习惯、渠道、兴趣及对新闻报道的评价作综合考察；后30个问题是《人民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的专题调查。

这是我国第一次采用电子计算机抽选样本和统计分析数据的民意调查，先后有20多家国内外的报刊、电台、通讯社发布消息或文章。国内新闻界评价它是“中国新闻事业一次突破性的行动”，“是在新闻界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创举”。参加调查的3家报社均将调查结果作为改进工作的依据，推动了报纸改革。这次调查引起国际传播学界的注意，日本、美国学者均写专论作介绍，日本文教大学传播系岸田功教授评价道：“采用科学方法实施社会调查并将其公开发表本身，就足以证明中国正在恢复正常的客观主义路线。”美国著名传播学教授E·V·罗杰斯在题为《北京受众研究》的长篇论文中写道：“这篇论文的目的在于报道中国首次大规模调查大众媒介受众的结果。这个调查是目前中国在传播研究领域中最早的科学成果之一。”又说：“北京受众调查是按照马克思哲学标准理论框架设计的。但它遵循传播研究的方法及西方和第三世界学者的实验理论方法，着重于注意这些方法与马列主义及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次调查说明在很短的时间里，中国传播研究者在进行调查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纽约Sharpe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丛书1985年夏季号，定名《媒介与中国受众》，将北京受众调查的全部报告译成英文登载。

1983年10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发起，有首都12个新闻单位参加的首都新闻学会受众调查组，同浙江省新闻单位联合开展浙江省受众抽样调查，共调查2532